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00 期 (总第 350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0 年 11 月 15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10月18日编者按：两年之后，又见4万亿！上一次来自中国，这一次来自美国。

秋冬交替时节，棉、菜、油、蛋等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此起彼伏，再次撩拨人们已然紧绷的通胀神经。高通胀山雨欲来，抑或已成事实？复杂成因中，本币超发、热钱涌入、成本驱动、需求拉动，各占几何？多重药方里，紧货币、管价格、保供给、调权重，孰为轻重？政商学界争辩背后，折射出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难题：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货币不能太紧，财政不能太松，汇率不能急升，加息不能过频，既要遂行短期目标，又要兼顾长期转型……

在通胀不断升温的年底岁末，老百姓手里的菜篮子越提越重了。这一期是本刊出版 100 期，总 350 期，喜庆中有一份沉重。围绕中心，扣住热点，服务好领导，这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本刊特此推出“战通胀”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谅能给您一些启迪。

要目

●本期专题/战通胀

战通胀

中国通胀高烧不退政策紧缩升温

中国为何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口诛笔伐

●国是论衡/中国经济真正失衡的是信心

●人物档案/仇和和一个城市的发展

●历史纵深/历史深处的来信

战通胀

与 2007 年以需求拉动为主的通胀相比，本轮通胀的成本推进因素明显增高。而在美联储量化宽松夹击下，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稳健，经济转型拐点亦悄然来临。

此次应对通胀的艰辛复杂局面再次表明，转型中国的宏观调控依然兼有宏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多重命题，其见步行步，瞻前顾后，左右摇摆，进退失据仍将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政策常态，无论战通胀还是保增长，均难毕其功于一役。然而为长远计，我们终须挥别种种过渡时期的权宜之策，转寻宏观政策常态化和长期化之道。以市场为归依，以转型作推手，以法治为辅佑，以改革求突破，厘定汇率、利率形成机制，理顺价格信号传导机制，疏通金融资本配置机制，完善宏观调控决策机制，循序渐进助推中国经济进入温和、可持续增长的新通道。

2008 年底，中国政府为应对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而推出的刺激经济计划，事后结果表明，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保增长，亦对全球经济触底后迅速复苏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

如今，美联储为避免美国经济微弱复苏后二次探底，继续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此举必然会延续美元弱势，在力保美国出口和就业复苏的同时，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冲击本已处于经济过热和通胀预期高企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再度面临的粮食和食品等局部价格上涨形势，中国原以为可控的温和通货膨胀预期，由此，出现了新的重要变量。会否刺激全面物价上涨？会否造成货币供应过量？会否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进而在明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相应的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是继续积极、适度宽松，还是应逐步回归稳健常态进而适度收紧？公众和决策层都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和通胀走势进行预测与判断。

一个共识渐显清晰：在内部成本上升和外部量化宽松合力推动下，高物价正浮出水面，高通胀或不容回避，相应的各项政策准备，须逐步协调到位。

量化宽松推手

美国放松货币，难改其国内通缩格局；新兴经济体收紧货币，难抵日趋上升的通胀压力

许多人期望的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没有在北半球深秋时节出现，G20 峰会将面临新的争议。

继中国央行 10 月底小幅重启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央行亦再次宣布加息。加上此前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加息行动，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全球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正进入逐步收紧的转折期。一些经济专家此前曾主张，美联储也应加入货币政策收紧之列。

但在北京时间 11 月 4 日凌晨，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决定到 2011 年 6 月底前购买 6000 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零至 0.25% 的水平不变。

此决定一出，纽约股市应声上涨，全球各主要股市亦随之呼应。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和研究专家们，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复杂艰难的流动性泛滥和高通胀挑战。

按照当日的人民币汇率计算（1 美元约合 6.66 元人民币），6000 亿美元约合 4 万亿元人民币。经济界人士认为，与两年前中国政府仅限于国内的财政刺激手段不同，美联储此举事实上是向全球注入流动性。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正在致力于管理通胀预期的新兴经济体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招致多方批评。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美联储宣布“二次宽松”有其紧迫性。今年三季度，美国 GDP 从年初 3.7% 的同比增速回落至 1.7%，官方公布的失业率继续在 9.5% 的高位徘徊，真实的失业状况则更为严重，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政策。通过货币的量化宽松，向实体经济继续注入流动性，似乎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政策选择。

不过，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美国经济收缩并非高利率所致，降低利率自然无法提振经济。美国投资机构的分析师也强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重振美国经济，对于解决失业问题也无直接帮助。他们举例说，受美国中小企业信用所限，很难从中分得一杯羹。

这意味着“二次宽松”并不一定有助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主要是跨国公司将继续从中受益。而跨国公司受益于“二次宽松”，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难以避免。

高盛中国的经济分析师乔虹 11 月 5 日表示，在美国出台量化宽松政策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避免更多游资进入，避免资产泡沫形成以及通货膨胀压力形成；另一方面若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明显脱钩，大幅升值、加息或增加资本管控，又会为国内就业以及经济周期带来下行风险，而如果不这么做，出口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亦不容忽视。

今年 8 月以来，美元超发形成的贬值撬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仅中国被动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进而加息管理通胀预期，更有澳大利亚、印度和越南同样选择加息，巴西选择提高本币债券利息，泰国索性重拾资本管制。

堤坝虽然高筑，怎奈热钱无孔不入。无论是八九月间中国楼市量价齐升的状况，还是股市在“十一”之后的直线上涨，均存有热钱流动的影像。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美国放松货币，难改其国内通缩格局，而新兴经济体收紧货币，难抵日趋上升的通胀压力。

出于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稳以及通胀情况的判断，决策研究者亦主张，非常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圆满完成使命，在当前形势下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逐步回归常态，即“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亦被外界视为中国央行接下来将全力迎战通胀。

通胀预期突增

通胀预期升高，直接影响 2011 年的宏观调控；有研究者提议将明年 CPI 警戒线从多年延续的 3% 上调到 4%，甚至 5%

与外部环境丕变同样复杂的是，中国内部经济形势亦在今年微妙生变。

进入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主题词已从二季度的增速放缓转化为温和通胀，即许多经济学家所主张的 CPI 同比增幅在 3%—5% 之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7 月、8 月、9 月连续三个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均在年初界定的 3% 的警戒线之上。

此时，温和通胀已非山雨欲来，而是既成事实。有所不同的是对这种局面的不同解释与争论，特别是展望四季度和明年，决策层与研究者为物价上涨和通胀趋势看法不一。

乔虹认为，中国的通胀水平有望在今年 10 月或 11 月达到高点，但控制通胀仍存风险。高盛 11 月 5 日发布研究预计，10 月 CPI 同比增幅有可能突破 4%，同时信贷和 M2 增速也将维持较高水平。

与部分专家所强调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有所不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对《财经》记者表示，输入性通胀才是本轮通胀的最大推手。

早在“二次宽松”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10 月下旬在“广交会”上即发出预警：“因美元发行不受控制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冲击’，当前这一问题引发的不确定性给企业造成的困难更大。”

此外，一些不愿具名的学者强调，中国央行最近两年大幅超发的货币，亦直接推动了通胀上行；而由于粮食和食品价格在 CPI 中所占权重较大，轮番上涨的农产品价格，则构成了本轮通胀最原始的动力。

时至今日，学界依旧在为本轮通胀的主因争论不休。在不同的经济学家眼中，三大成因的先后顺序各有不同。

据《财经》记者了解，最近一段时期，决策层与智囊层保持对通胀问题的密切互动：一方面，通胀预期升高，直接影响 2011 年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者提议，可考虑将明年 CPI 警戒线从多年延续的 3% 上调到 4%，甚至 5%。

11 月 4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0 月下旬 50 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10 月下旬，在检测的七种蔬菜中，价格出现普涨之势，其中，豆角价格涨幅居前。这与 10 月上旬七种蔬菜涨跌互现的格局已然不同。

此外，10 月下旬 50 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显示，食用油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其中 5L 桶装大豆油价格上涨 7%，一级散装菜籽油价格上涨 2.3%。而肉、禽、蛋类食品价格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扬，其中鸡蛋上涨幅度较大，较 10 月上旬涨幅达 2%。

同一时间，由国家发改委公布的 10 月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显示，31 种产品中，近 80% 价格上涨。

商务部 11 月 3 日发布的商务预报监测也显示，10 月 25 日至 31 日期间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和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与前一周相比，均有小幅上涨。

上述价格上涨，并非短期态势。海通证券 11 月 1 日发布报告称，过去半年来，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已经涨了 57%，大米涨了 45%，糖涨了 55%，大豆价格涨到了过去 16 个月以来的最高值。而在中国大陆，每吨棉花的单价，已从 2007 年的 1.3 万元翻倍为 2010 年 10 月的 2.6 万元，且大有继续上涨之势。

由于食品权重在 CPI 权重构成中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大宗农产品价格和居民消费食品价格的普涨成为 CPI 上行的主要推手。10 月 21 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新涨价因素的影响主要来源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和居住价格的上涨，为 8 月、9 月 CPI 同比增速分别贡献了八成和九成的力量。

在“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之后，“糖高宗”和“苹什么”又浮出水面。因为农产品局部歉收，并预期相关价格上涨，部分民间游资轮番集中炒作大蒜、生姜、绿豆、食糖、苹果等农副产品或食品，9 月，CPI 同比增速达 3.6%，创下 23 个月以来新高。

而民众对价格上涨的普遍感受，则又远较 3.6% 为高。“实际上的通货膨胀比公布的 CPI 要高得多。”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奇渊向《财经》记者表示。不过，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统计佐证，此说在学界亦存在争议。

最近一段时期，部分深圳市民前往香港采购日用品，因为同样的蔬菜和粮食，香港售价比深圳便宜 5% 至 20% 不等。据《新闻晨报》报道：一瓶 500 毫升李锦记生抽酱油香港售价 5.95 元（按港币兑换人民币 0.8619 汇率换算），而深圳超市价格是 6.6 元；一瓶 750 毫升潘婷洗发水香港售价折合人民币 44 元，而深圳卖到 54 元。

资产价格升温

全球流动性持续过剩和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套利资本大量流入，加剧了新兴市场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及货币升值压力

美联储宣布“二次宽松”政策后，中国内地股市亦结束近期震荡恢复上涨。11月5日，上证指数突破3100点关口，报收3129.5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38%，深成指报收于13733.4点，涨幅1.01%，两市合计成交4613.48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有所放大。

证券投资机构分析表明，A股各板块处于全线上涨状态，尤以资源、能源、供水供气、工程建设以及食品消费等通胀和资产价格敏感行业为最。乐观的分析师开始预期新一轮股市反弹，跨年度的牛市行情似乎在开始预演。

一些经济专家向《财经》记者提及这样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7.2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而这一数据，在去年同一时期则为13.98万亿元。如果按2009年的价格来计算，今年上半年的GDP本应为15.54万亿元（13.98乘以111.1%），而实际发生的GDP为17.28万亿元，多出了11.23%，远远超过同期2.6%的CPI同比增速。

“这也是一个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CPI考虑的是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和劳务价格变化，而这个指标考虑的则是中国新生产的全部财富的价格水平变化。”徐奇渊说。

此时，游离于CPI之外的资产价格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0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由于全球流动性持续过剩和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套利资本大量流入经济增长形势看好、利差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剧了新兴市场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及货币升值压力。

乔虹认为，包括中国香港、印度、巴西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已出现明显游资冲击现象，虽然中国内地似乎还没有出现更多游资冲击，但从资金流入方向以及其资金对于房地产等行业资产价格推高上看，目前也已经到了“令人警醒的时点”。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胡祖六也表示，中国的通胀风险不可低估，更大风险是潜在的资产价格泡沫膨胀。

过去十年间，受加入WTO等利好因素的拉动，中国制造业长期呈产能过剩之势，PPI（工业品出厂价格）长期偏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通胀难以长期走高的基本判断。

在美联储“二次宽松”出炉之前，亦有学者表示，中国今年三季度PPI的月度同比增速均已回落至5%以内——PPI作为核心CPI的先行指标，往往可以在五六个月后传导至CPI——未来CPI也存在下行压力。

但“二次宽松”出炉之后，大宗商品价格再度飙升已是中期格局，或将在 2011 年 1 月—2 月间传导到中国大陆的 PPI，进而拉动 CPI 在未来半年内冲高。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决策层与智囊层的互动中，CPI 在近期内的两个高点被提出。其一为今年 9 月—10 月间，CPI 将达到 2010 年的顶点；其二则是 2011 年 6 月—7 月间，CPI 可能冲破 4% 的关口，而明年的目标——如果成本推动因素和输入性通胀因素被很好化解——可望控制在 4% 以下。

关于第一个顶点，已正在接近现实。10 月下旬，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一次论坛上公开表示，9 月的 CPI 为 3.6%，10 月可能还要更高一点，但全年控制在 3% 以内还是有可能的。

关于第二个顶点，在成本推动和输入性通胀因素受控的前提下，通过 M2（广义货币供应量）即可得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向《财经》记者指出，M2 作为 CPI 的另一项先行指标，往往比 CPI 先行 11 个月左右。

今年二季度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之后，中央于 7 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短期回调至“保增长”。随后的 8 月—9 月间，原本已经回落至 17%—18% 区间的 M2 同比增速再度回升至 19% 以上，并将于 2011 年夏季传导至 CPI。

通胀成因复杂

远虑近忧叠加效应之下，通胀推手呈令人眼花缭乱之势，而关于成因的激辩，更预示着决策应对手段的选择之难

目前较为一致的官方机构说法是，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但通胀形势可控。而对于引发新一轮通胀的成因分析差异，则指向不同的政策主张。

汪同三认为，本轮通胀的幕后推手多元且变量很多，成因略显复杂。而包括曹远征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则指出，本轮通胀的最大特征，在于成本推进，与 2007 年间的上一轮通胀主要由需求拉动有所不同。

数据显示，尽管成本推进已成推动 CPI 远期上行的重要推手，但短期供求关系的变化、货币的超发、输入性通胀因素亦非常明显。

大宗农产品中，棉花价格的涨幅，因为较之三年前翻了一番而备受关注。国家粮食局的数据显示，棉花供给近年发生了较大波动。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 2000 年，中国大陆棉花产量仅为 441 万吨，伴随着入世之后全球头号棉纺织品出口国的需求拉动，棉花产量开始大幅走高，2004 年达到 632 万吨，2006 年—2008 年间每年均超过 700 万吨，其中，2008 年棉花产量达到史上最高：760 万吨。

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不振，导致棉花产量在 2009 年大幅减产至 637.7 万吨，下跌 15%。2010 年，外需迅速复苏。商务部数据显示，2009 年 12 月出口同比增速回正以来，于 2010 年 5 月一度冲高至 48.5%。此时，以 2009 年减产 15% 的棉花产量对应棉纺织业复苏的需求，价格开始一路冲高。

同样在近十年，玉米需求亦大幅攀升。2000 年，中国大陆玉米产量仅为 1 亿吨，2009 年已上升至 1.63 亿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对《财经》记者表示，畜牧业（如猪饲料）和工业需求（如酒精）的拉动，是造成玉米产量和价格上升的主因。

2006 年之前，中国大陆玉米尚有余力小额出口。在那之后，玉米进口量逐年增多。2009 年全年，玉米出口仅 10 万吨，进口 70 万吨，等于净进口 60 万吨。产需缺口，可见一斑。

IGC（国际谷物理事会）9 月 30 日发布报告称，预计今年全球玉米产量 8.24 亿吨，同比增长 1.73%；预计需求为 8.37 亿吨，同比增长 6.98%。库存消费比为 15.65%，较 17% 的警戒线低了 1.35 个百分点，无形中推高了玉米涨价的预期。

与棉花和玉米相比，糖和食用油则要更多地看别国“脸色”。2009 年，全国糖产量 1200 万吨，消费 1450 万吨，净进口 250 万吨，“处在长期短缺的状态。”徐小青说。至于食用油，由于中国现时 76% 的大豆依靠进口，从某种意义上讲食用油定价权亦尽属外方。

在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供需关系的紧张，又因本币超发与热钱涌入而更趋加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 11 月 4 日指出，中国货币存量已是全球第一，超过 10 万亿美元，目前 M2 的增速达到 19%，与 GDP 的比重达到 200%，创世界纪录。如此多的货币存量，势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的金融风险，导致资产泡沫、流动性过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对《财经》记者强调，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从发生机制层面看归根到底是货币过量发行的结果，“刺激政策确实很快取得积极成效，然而事后看剂量偏重也有不利影响。”

而国际上因应美元贬值所导致的热钱涌入，也推高了大宗农产品价格，“每一轮大宗农产品涨价背后，都或多或少有游资的影子。”徐小青说，“当然，苍蝇不叮没缝儿的蛋，首先还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才会有炒作”。

相对于供需紧张、资本追逐等短期因素，“欠账式成本补偿”亦已成为通胀的长期推手，无论是上一轮通胀，还是新一轮物价上涨，成本拉动之势均很明显。但在 2010 年的新一轮通胀中，成本驱动因素更显强势。

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度平均工资同比上涨 16% 左右。此外，社保标准提高、资源税从价计征（5 月，新疆试点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税率 5%；两个月后，试点拓展到西部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 年煤炭资源税有望开征）、环境保护力度增强（例如正在进行的“十一五”节能冲刺）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 CPI 构成上行压力。

而在过去十年间，城市化率以每年 1.2 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农业人口的转移，亦成为推高农产品价格上行的结构性因素，进而影响通胀。

远虑近忧叠加效应之下，通胀推手呈令人眼花缭乱之势，而关于成因的激辩，更预示着决策应对手段的选择之难。

多重应对手段

在总量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之外，则是对应成本推进型通胀的治理措施，包括协商工资适度上涨、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及必要时限制部分商品价格过快上涨

就在美联储宣布“二次宽松”之后仅仅数小时，北京 2010 年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开始举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两位委员李稻葵和夏斌，以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均释放出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信号。

李稻葵称，当经济增速稳定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转向，由宽松转向稳健。张建华则表示，非常时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已圆满完成使命，表现为币值稳定，经济平衡较快发展，2011 年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将有较大改变，因此需要回归常态、稳健的货币政策。

除了外部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企稳，也为近期结束已实施两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留足了空间。

国家统计局于 10 月 2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投资增速在三季度的按月同比增速分别为 22.35%、23.92%和 23.18%，投资增速已然企稳——“十一五”期间，绝大多数时期的投资增速均在这一水平上下。而消费增速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三季度按月分别增长 17.90%、18.40%和 18.80%。

“投资和消费企稳，明年保八就不是问题。”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表示，“只要出口不拖后腿就行。”

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出口增速按月回落，分别为 38.10%、34.40%和 25.10%，尚无明年拖后腿的迹象。

曹远征指出，此前在正增长 3%区间徘徊两年之久的、与出口密切相关的港澳台外商投资增速目前已回升至 20%这一区间，显示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增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对《财经》记者表示，上一轮经济周期中（2003 年—2007 年）10%以上的 GDP 增长并不是常态。只要在由环境、资源制约的 8%-10%

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符合追求指标（多年来皆为8%，今后也可能在8%或7%以下），就不是下滑，不存在探底问题，而是回落、趋稳。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曾表示，货币老虎愈养愈大，如何把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已成当务之急。11月4日，李稻葵和夏斌均表示，明年的M2增速如果定在15%—16%，则非常理想。

“理想”一词，源自对现实的无奈，2009年和2010年，M2同比增速均超预期，特别是2009年，预计增速17%，实际增速却高达29%。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适度收紧，去年即已启动。其间存款准备金四度上调，资本充足率和货币掉期亦是银监会和央行的工作重点，而进入10月，央行在时隔34个月首度加息，均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流动性过剩。

此番货币政策将转未转之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由于加息的双刃剑效应，在抬高热钱炒作成本的同时，也可能造成热钱因应利差的加速涌入。“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等数量型手段更应受到重视。”刘元春对《财经》记者说。

除了货币政策需要调整，汪同三称，在进一步观察之后，或许也应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赤字——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为7500亿元，2010年为85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但更多学者主张积极财政暂不大动，从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后，可以继续此前4万亿元投资等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且已经启动的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改革，以及战线更长的城市化进程和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巨量的财政持续投入。

在总量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之外，则是对应成本推进型通胀的治理措施。曹远征建议，对工资上涨，需加强工会组织工资集体协商的力度；对农产品价格上涨，则需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曹远征和汪同三等人还建议，在价格非理性上涨，对经济社会秩序，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之时，除了不可或缺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亦可在特殊时期启动非常化的行政管理手段——限制部分商品价格过快上涨。

通胀容忍争议

一方面是支持适度提升通胀容忍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此的质疑，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官方公布的CPI是否低估了真实的通胀

面对高通胀压力，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支持适度提升通胀容忍度。厉以宁、吴晓灵、汪同三、张汉亚、刘元春等人均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0月中旬，厉以宁公开称，考虑到GDP增速、M2增速和CPI增速之间的关系（通常，M2增速等于GDP增速加上CPI增速），应将通胀目标上调至4.5%，否则，按照低通胀指标进行宏观调控，会带来诸多其他问题。

曹远征提出，在生活水平上升，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背景下，食品类权重占比CPI三分之一的格局亦需调整。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家统计局的确在着手进行该项改革，但是，因应短期目标——即明年“两会”上宣布的当年CPI警戒线是否应该做出调整，却是当前的主要课题。负责此项研究的汪同三表示，中国社科院给出的政策建议将是4%。

不过，反对中国提高通胀容忍度的声音亦不绝于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刘向东向《财经》记者分析指出，首先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一是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常常价格传导不顺，比如某些商品出现批零价格倒挂现象，这些都难以反应到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中；二是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这已经不能真实反映真实通胀状况，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

此外，刘向东也指出，自从今年2月CPI达到2.7%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后，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八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如果硬加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困境，更难消除负利率带来的影响。

强化通胀预期管理则得到业界的共同认可。通胀预期管理的核心一方面在于要尽快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猪肉、大蒜、食糖等食品供应，依法严惩游资囤积炒作行为，另一方面的关键则是让民众尽快知悉真实的供求信息。

联合国粮农组织9月30日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全球今年大米产量预计为4.67亿吨，同比增长2.9%；消费预计为4.6亿吨，同比增长1.8%，库存消费比为28.9%，远高于17%的警戒线。全球今年小麦预计产量6.5亿吨，同比下降4.7%；消费预计为6.66亿吨，同比增长1.1%，这虽然推高了小麦的价格，但是，库存消费比为27.7%，同样高于警戒线。

而在国内，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3月末，全国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总库存4508亿斤（22540万吨），2008年，全国粮食消费量10790亿斤（53950万吨）。根据以上两个数据，可以计算得出我国的粮食库存比为41.8%，远高于警戒线。

徐小青表示，由于占粮食总产量四分之三的秋粮丰收，尽管夏粮减产0.03%，预计粮食连续第七年丰收的可能性很大，“总供给面没出问题，即使成本推进，价格也不至于涨得离谱。”

纷纭复杂的情势对宏观调控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考验。汪同三表示，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保持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特别是要观察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国际形势变化。

卢峰对《财经》记者表示，利率调节作为宏观政策手段，本质上是一个短期政策工具，今后走势还要结合未来宏观经济形势评估。到底是否进入所谓加息周期或加息通道，还要看今后一两个季度宏观经济走势而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竞争力与风险研究中心主任任若恩也向《财经》记者表示，以往经验证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宏观政策“往往只能管半年”，当出现新的变量，就需要随时调整，今年和明年也可能是这样。

倒逼经济转型

在防范和应对新一轮物价上涨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政策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由外贸、投资为主，逐步转向内需，特别是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主，而这需要经济增长目标从高速增长回归适度增长

相对于仅针对管理通胀预期、应对恶性通胀的种种举措，研究者和决策者更深层的分析与建议，则集中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从长远看，在防范和应对新一轮物价上涨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政策协调，推进中国经济由外贸、投资为主，逐步转向内需，特别是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主。但这一转型过程，很可能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缓。

对此，多数学者并不担忧。尹中卿表示，后危机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回归6%—9%，就是回归常态，回归适度增长。曹远征甚至认为，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只靠居民消费拉动，6%的GDP同比增速也可能已是上限。

但海外投行的预测仍然较为积极。乔虹11月5日表示，今年中国GDP增速将达到10.1%，而明年则仍有望达到10%左右的长期趋势水平。

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基调，任若恩定性为：温和增长，温和通胀。这略微有别于此前主流声音有意抬高GDP增速、有意压低CPI上涨的语境。

《财经》记者接触到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应急手段终结之际，在二季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三季度通胀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业已进入一个新的通道。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增长减速不是会否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发生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日本经济40年前和韩国经济20年前的拐点。拐点之后，增长减速，通胀加速，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三个重要经济比率：消费占GDP比重、服务业占GDP比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会迅速上升。

王庆指出，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将拖缓劳动力增长，与此同时，对应人口老龄化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和资本率走低，预计有关部门将向国企征收红利以期弥补相关缺口。

果然，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五个中央部门(单位)和两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兼顾中央企业承受能力和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考虑到中国之大，王庆认为中国经济减速的发生可能会很缓慢。其中，农地改革和户籍的放松、投资下滑缓慢、发展债券市场和放松利率管制、放宽国家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医疗、教育、电信、媒体、运输等）措施均可对冲GDP增速下滑。

曹远征表示，应急政策终结之后，面对未来温和通胀的格局，宏观经济政策应向常态化转变，短期政策应向长期化转变。其中，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已愈发迫在眉睫。李稻葵、夏斌、周其仁三位学者亦均在不同场合作了相同的表述。

社科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指出，面对热钱的快进快出，亟须将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上议事日程。他认为如果能够发行人民币债券，必将减少因应外汇储备增加而不断释放的流动性。“如果能给3%—5%的利息，比起8%的GDP增速也算不了什么，即可把热钱引导到它本不愿去的薄弱环节上去，比如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肖炼说。

当然，此一操作需以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为先决条件。曹远征表示，从长期看，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改革的方向。这有赖于人民币完全恢复兑换性。

目前，人民币在经常项下已恢复可兑换性；在资本项下，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40个管制项目也已大部分恢复兑换性，目前尚有管制的主要是三个设计资本主体行为的科目，即外商直接投资审批、中国居民对外负债需进入外债规模、中国资本市场仅通过QFII（境外机构投资者）有限度的对外开放。

他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排出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时间表，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这一目标，从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奠定基础条件。

据央行和香港方面的统计，2009年7月2日人民币实行跨境贸易结算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达1450亿元，其中80%的结算发生在香港，并相应催生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曹远征认为，这有可能开辟本币首先在本经济体外，进而在经济体内实现可兑换的新路线。

收取输出通胀便利之外，人民币更广泛的国际使用也会为各国储备货币分散化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条件，并最终对冲当前输入性通胀的巨大压力。

此外，《财经》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官学两界人士亦指出，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经济，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等结构性改革亦不容延宕。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战通胀不容回

避，但出路与选择却还有很多，关键要看利益相关者的权衡和博弈。（《财经》2010 年第 23 期 杨中旭 王延春 王毕强）

中国通胀高烧不退政策紧缩升温

美国的印钞刺激经济计划加剧全球对物价上涨的忧虑,中国的物价涨势亦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在严峻的通胀形势下,中国央行周三再度出手对一些银行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更引发市场对政策进一步收紧的预期.

中国官员一再表示,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下,资金流入中国的压力加大.而周三公布的中国贸易顺差创新高,则提醒了北京政府另一个令人头痛的流动性来源.

消息人士周三对路透表示,央行上调了数家国有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其中包括交通银行(601328.SS:行情)(3328.HK:行情)、中国银行(601988.SS:行情)(3988.HK:行情)等,加强了紧缩货币的力度.

"(一些紧缩)措施起作用要大概到半年以后,所以现在如果不行动,到半年后我们的通胀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说.

货币收紧的信号在当日金融市场上充分反应,中资银行股领跌,中国银行 H 股收挫 2.93%,交通银行 H 股跌 2.90%,香港恒生指数同期跌 0.85%.

此外,央行祭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回收部分银行流动性后,近期将升息的预期亦进一步加重,人民币利率互换(IRS)报价普涨.中国银行间债市现券收益率总体上行,其中剩馀期限近三年的央票收益率涨约 10 个基点(bp).

中国国家统计局将于周四公布 10 月份宏观数据,路透调查显示 10 月份 CPI 同比涨幅为 4%,市场传言则高达 4.4%.

****难消通胀预期****

面对日益升温的通胀预期,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周三明确表示,此次物价上涨的特点不是因为短缺引起,而是流动性过剩.

他表示,当前的物价上涨原因包括货币发行过量."特别是最近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这几天国际市场大部分商品价格在急剧上涨,石油到了 87 美元,棉花、糖涨得很厉害."

此外,临时性的因素,如灾害天气导致的今年蔬菜价格上涨,以及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快速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

而热钱的炒作也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热钱炒作的因素也使得今年上半年绿豆、大蒜、棉花等都出现了价格上涨."周望军称.

"现在来看全年 CPI 涨幅要比 3% 要高一点,但也高不了多少,仍然符合年初预期价格调控目标."他说,"防止物价持续上涨这个问题是我们重点考虑的."

对于央行收紧流动性的新举措,湘财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杨森表示,"我们认为央行此举主要是出于抑制通胀的考虑.虽然最新的 CPI 数据还没有公布,但从目前各方信息看,应该不会低于 4%,国内通胀压力增大,而全球流动性过剩."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周二曾表示,估计今年的 CPI 涨幅要稍微高于年初制定的 3% 目标,物价形势比想象的严峻,但强调今年有信心控制好物价.这也是国家部委有关负责人首次表示今年物价涨幅会超 3%.

对于应对通膨的举措,周望军指出,要重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粮食、生猪等农产品和基本消费品供应充足;通过物资调配、进出口等手段调节,以及采取一些宏观的措施,比如运用财政政策,加强市场价格监管,防止游资进行炒作.

****政策收紧预期升温****

中国央行周三的举动或许从侧面显示中国要控制物价上涨的趋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从中国年内两次重拳调控过快上涨的房价但成效有限上可略见一斑.市场对政策收紧的预期进一步升温.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称,中国当前物价形势比较严峻,利率要适应通胀形势并及时调整.

此外,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以及加强对"热钱"的监控,以及如何强化管理通胀预期也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周望军就指出,要从宏观上进行管理,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调控,中国现在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考虑保持货币流动性的适度和均衡.

同时中国将采取多方面措施,包括不允许炒作群众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油蛋等,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以及建立一个专门的机制.

"应该对游资的动向有一个监控,严格制止他们在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市场炒作,要建立专门的机制来防范."周望军称.

中国官方刊物了望杂志最新一期刊登署名文章亦称,中国当前总供求大体平衡,食品价格不会全面快速上涨,输入型通胀压力不会很大,但资产价格主导通胀预期,因此调控重点高度关注游资炒作和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这么多年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也完全不会出现滞涨的现象."他说."(2010年11月10日 沈燕 屈桂娟)

中国为何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口诛笔伐

中国猛烈抨击美国全力开动“印钞机”的作法,中国官方媒体甚至指出,美联储计划逐步向市场投放 6,000 亿美元购买债券,相当于操控汇率。

但其实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的冲击,小于其他多数国家所受冲击。中国激发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有点像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攻击。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会损及一些国家。首先,资金会转而寻求比西方更高的回报,这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其次,货币被动升值可能削弱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美元因供应过量而贬值,而巴西雷亚尔、泰铢和韩圜则相应升值。

但中国在这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其实有点奇怪。中国兼具经济高速增长与资产价格上涨的特征,但人民币仍主要与美元挂钩,6月迄今仅升值 2%,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则大幅升值。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元越贬值,中国出口就越受益。中国定于本周三发布的 10 月贸易顺差很可能跳升至 260 亿美元。

而中国的资本管控也可能加剧其他国家面临的困境。投资于由于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于是就可能尝试其他与中国大陆类似的市场,譬如泰国、韩国、印尼以及台湾。

当然并非说美国量化宽松对中国有利无弊。毕竟,过剩资金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到中国,譬如推高全球初级商品和能源价格,推升中国的通胀率。

但鉴于 G20 峰会即将举行,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当前抨击美国量化宽松的姿态,更多是为了转移各国注意力。

背景新闻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周一称,美方量化宽松政策的宣布“对全球金融市场是震动”,批评美国未认识到稳定全球市场的责任。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也表示,美国政策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美国应对此作出适当解释。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等于间接操控汇率。

--其他国家也对美国政策作出了回应,韩国上周表示将考虑管控资本流动,巴西则表示可能相应采取报复性措施。(2010年11月9日 作者 JohnFoley 为路透专栏撰稿人)

中国经济真正失衡的是信心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失衡一直被各方众口一词地指责为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具体而言，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过度消费，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过度依赖出口。但世界主要国家目前的施政却似乎正在加剧而非纠正这种失衡。美国为刺激国内经济又实施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这一政策见效，势必会推动美国的国内消费，美国今年迄今的贸易赤字相比去年提高了40%就是明证。中国虽然一再表示要更多依靠国内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但出口增速却持续快于国内消费的增长速度，出口重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说，世界各国目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保经济增长作为了头等要务，而扭转经济失衡的口号虽然叫得山响，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们不必无谓地指责人类目光短浅，因为自有人类以来“保增长”就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轴，不引发社会剧烈阵痛的结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在经济顺畅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世界各国自废武功来调结构的局面只存在于幻想中，或许正因为此，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才对通过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重回正轨持悲观看法。如果世界各国通过自我牺牲来扭转全球失衡这条路走不通，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各国自扫门前雪的前提下逐步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呢？

我们先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公报中未提下一个五年要达到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却强调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彰显了中国决策者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信心，却也透露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微观层面的问题才是真正令决策者揪心的事。可以说，中国上下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信心是足的，而在提高家庭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微观方面则相对缺乏信心。因此，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中国真正失衡的是信心，对宏观经济前景有信心，而对微观经济形势则信心不够。

无独有偶，美国经济真正失衡的也是信心，但正好与中国相反，美国上下对宏观经济增长前景缺乏信心，但对美国经济在微观层面的活力却没有理由不具信心。苹果公司横空出世的iPhone智能手机一举打破了诺基亚和三星对全球手机市场的垄断局面，将“美国创造”的市场活力展现无遗。

鉴于世界的关注焦点正日益集中在所谓“中美对决”上，似乎人民币不升值必然损害美国利益，美联储坚持量化宽松政策必然损害中国利益，好像中美两国在玩跷跷板，一方升上去另一方就必须降下来，我们不妨看看这两个国家有没有可能在各自扫门前雪的前提下帮助扭转世界经济的失衡。美国欠缺的是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而鉴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

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中国的宏观经济前景越好越有助于弥补美国的信心短板；中国欠缺的是对优化经济结构的信心，而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过后加快创新和转型步伐则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促进作用，中国的服务外包行业在金融危机以来的快速发展就是明证。

可以这么说，如果中美两国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拼命提升自己的信心短板上，很可能事半功半，而如果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借助对方的信心长板来弥补自己的信心短板上，则很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努力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是扭转自身困境的最有效、最现实的办法，这一条人生经验似乎同样适用于扭转全球经济失衡。（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人物档案

仇和和一个城市的发展

在长达半年时间里，一个名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的新地产项目，以“低碳生活”、“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等噱头在各种媒体和活动中频繁亮相，并采取签订《职工集体委托代建协议书》、《项目建设投资协议》及《选房确认书》等方式，收取了 2000 多名购房者房款总价 30% 的“代建诚意金”高达 3 亿元。

按照昆明警方在 2010 年 10 月 12 日通报的情况，“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仇和书记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这个事件的出现及其被警方高调查处都非常蹊跷，众所周知昆明不止一个房地产项目是类似违规手段操作出来的。”网友说，这个事件将给仇和今后的工作开展带来负面影响，后期处理不好会形成遗憾结局。

昆明在改变

“流经城区的 36 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这是许多昆明人近两年来最开心看到的转变之一，而且他们都把这样的变化与仇和的执政联系在一起。

“由昆明市 36 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

责任制”，而他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2007年12月末，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成为主政一方的“改革派官员”群体中，能不断升迁、不断获得新平台继续其改革事业的代表，也一度成为“东部官员到西部任职”的干部调动模式的鲜亮样板。

“几乎所有昆明人早期都对仇和的到来倾注了美好的期望。”网络人士“边民”表示，仇和给昆明带来的变化有许多，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事务，而其本人也在争议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生道路。

城市建设、滇池治理、招商引资、城中村改造、地铁工程、改变机关工作作风，甚至计划将教育、医疗行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仇和已经在昆明掀起了很多不可阻挡的“旋风”。对于种种诧异与不解，仇和的表态是：“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那么多的工作，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短期内昆明也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获得巨大突破。”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不过这些正是仇和希望改善昆明基础设施，提升投资环境的动力和理由。在地方税收来源缺乏，无太多财政潜力再挖的情况下，他也走上了不少地方政府流行的老路，即从土地上做文章。”

他表示，“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宣传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昆明主要是靠城中村改造来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土地来源，随着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昆明的房价未来必将长期处在高位运行。”

生活在昆明的退休老干部康佳说：“由于涉及的工作内容太深、太广，他把昆明本地的老百姓、公务员、权贵三方都骚扰了，或者说得罪了，这样的情况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水平。”他认为仇和的工作力度很大，给昆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昆明历史上难得的市委书记。

“仇和早期惩治公务员的举动获得了老百姓的叫好，但他后来决定拆除居民阳台上的防盗笼时，老百姓的反对声就来了。”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民意也不一定靠得住，老百姓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微小利益得失而发生变化。”

的确，“拆防盗笼”使昆明老百姓对仇和的评价发生了变化。网民“饕饕”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发现仇和的举动也会涉及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仇和的这项政策设计还有一些纰漏。

“比如开始要全部拆，后来又变成沿道路拆，后来又变成沿街拆，变化很多、很快。”他说，“另外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而且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对于建设昆明的思路，仇和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2010年10月21日，又收获了一项——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

“仇和的做法肯定会让一些人不满意，但各方要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石鹏飞说，“不过仇和在发展的同时还是要考虑本地老百姓的承受力，目前的建设的确过多过于密集了，老百姓叫叫苦、骂几句也是在情理之中。”

仇和来到昆明后很少与外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访问，但也有人举例《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一度摆满了云南省的各种书店、报摊，其“并非完全低调”，“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一直处于非议之中”似乎已经成为仇和仕途、行为的特征。2010年4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设立了《“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以期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并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

不是完美的发展

为保证城中村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昆明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仇和为政委，市长张祖林为组长，市政协主席田云翔、副市长陈勇等为副组长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一名昆明房地产商人透露，为了实现土地盘活，仇和想出了许多办法，“除了从以前已经获得土地的老板身上再收点差价，还千方百计让每一块土地的价格都往上升”。

“仇和经常直接过问具体的土地项目。”他说，“他经常组织各种部门领导、房地产老板在一起开会，直接谈想法、下命令。”

这名商人说，“我们也理解仇和是因为着急，他太希望昆明早点变个样，他的宏伟蓝图早点造就。于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就采取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却也留下了许多麻烦。”

“在我看来，仇和的风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整个昆明在他眼中就是一家大公司，自己是董事长，其他人只是项目经理，这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说的‘经营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

不过，财政方面的数据也透出了昆明发展方式的一些隐忧。2009年，昆明政府性融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近5倍，分别为962亿元和201亿元，另外有中央和省财政补助的53.71亿元。显然，仇和所采取的方法是让昆明“举债建设”。

“政府性融资也被称作地方政府性债务，即凭政府信用以有偿借用的方式获得的要还本付息资金。”这名官员透露，“按照目前的举债速度和财政收入及开支情况，只有让昆明的财政收入尽快获得大幅度增长。”

他认为，仇和现在对昆明的种种基础建设投入，就是期望提高昆明城市的含金量，以保证在未来获得更多收益，“这样的思路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生意投资，只不过这个项目是座城市，里面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不是一个纯粹企业那么简单。既然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风险和利益的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的”。

2010年第三季度，在中国城市地价监测系统的公布中，昆明综合地价环比涨幅超过5%，位列全国第三，同比涨幅超过20%，位列全国第二。一名昆明房地产商透露，仇和一方面希望控制好商品房的建设速度，寻找机遇继续提升其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则强令各区县必须限期完成经济适用房建设任务，以供应给本地普通老百姓，“他不可能不知道高房价背后的矛盾与危机，只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在仇和所率领的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建设工作进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事件”。

“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2010年8月14日，昆明市长张祖林在现场调研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情况时，这样表示。

“打瞌睡”、“玩游戏”、“打麻将”……除了直接的监督、处罚，仇和最让昆明官员们担心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由于缺乏基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招商引资工作有些不切实际，也让人无法忍受。”

的确，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

云南省一名国有建筑商人则说，“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目前昆明建设工程的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这对于本地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云南企业无论市场收益还是技术进步方面都会越来越被动。”

另外，仇和对昆明基层民主的建设与创新突破不大。在2010年夏天的“西南大旱”期间农村地区损失惨重，成为了仇和工作中的缺憾。

一种合理的担忧是，没有农村的富裕、稳定，没有基层民主的建设、发展，昆明市即使再盖起更多的高楼，修出更多的道路，仍然解决不了贫富、城乡差距引发的麻烦。

“诈骗案”的隐忧

伴随着昆明市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陆续开工，为避免“项目上马、干部倒下”，昆明市委、市政府39名市级官员在2008年12月签名承诺廉洁从政，仇和名列第一。该承诺

书表示：决不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递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决不允许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以实际行动营造昆明市建筑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边民”认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件的出现让不少官员难辞其咎。一块还没有被政府批准开发的土地项目，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却能将“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的广告做得铺天盖地满城皆知，发布广告的媒体固然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不验看开发商必备的合法手续，更奇怪的是一些市场监管部门无所作为。

按照昆明警方的公布，该案已抓获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庆荣等 16 名犯罪嫌疑人，冻结涉案资金 1.84 亿余元，追回并扣押涉案款项 1537 万余元及高档车辆 18 辆，冻结涉案房产 4 套。

一名支付了 20 余万元的昆明律师说：“首先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房子价格的确便宜，其次是看见那么多人都在买，尤其一些政府部门的人都在购买、宣传，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诈骗案。”

他表示，由于国家的调控政策导致开发商资金链中断，加上昆明市对各种审批节奏一直有意加以控制，让那些还没开工建设或正在建设的房子不能提前向市场预售，于是低价的“委托代建”、“单位团购”等应对措施应运而生，这种方式一度帮助开发商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房子盖起来后也是皆大欢喜。

“可以说云南省房地产界的公司都或多或少地操作过这种项目，而且不少政府部门都参与了类似的集资行动。”这名律师强调，“对于这个案件的性质，目前昆明本地各种人士的说法很多，并不完全认同警方宣称的‘诈骗’。”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感觉就认为‘不可能是诈骗案’，谁会傻到诈骗了 3 亿还要等着警察来抓，居然还在银行账户上放着 1.84 亿，而是早就逃之夭夭了。”昆明市一名房地产商说，“做这一行的都清楚，这家地产公司是在违规操作先吸纳资金，但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诈骗，而是要把此项目做成，因为后者一旦成功也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其没有必要冒诈骗的风险。”

目前，对于“华西”案件被查处的原因，昆明本地至少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为了保证昆明房地产获得更高收益，已经结合国家的有关政策三令五申，项目手续不全不准以任何名义提前集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昆明地区屡禁不止。此前昆明市曾经对 20 家有类似问题的地产项目发出过警告，这个“华西”项目也在其中。由于这家公司的表现也过于高调，加之并没有多少实力背景，所以不幸被拿来“杀鸡给猴看”，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由于该案件涉及江苏企业，势必有人想当然地以为“与仇和有关”。在一种可以想象的利益斗争玄机里，由警察力量出面成功打击，势必会让仇和难堪，甚至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 2009 年末昆明市二环路内新建商品房成本每平方米已经达到 5800 元，而一些项目却以 5000 元在提前集资，这样的合约最后怎么可能成功履行，不闹出乱子才怪。”他说，“其实有些房地产商人也很有阴谋，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提前参与，最后对政府形成压力，后者要顾及社会稳定则不得被迫办理各种手续，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目前形势。”

意外的情况还有：2010 年 10 月 15 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区分局国保大队两名警察找到曾经报道“华西”案件的某报驻云南记者，要求后者“为了维护昆明稳定，今后不再对该案做追踪报道”。随后昆明市委、政府出面道歉，称不是政府安排警察找记者，并表示将对涉案警察进行调查。（南风窗 2010-11-05 尹鸿伟）

●历史纵深

历史深处的来信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为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 44 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受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 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 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 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 60 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的更长。在 1966 年，文革初肇，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 1772 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 月 21 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

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 60 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坚硬的历史正在反思之盐的催动下溶解。发生在程璧与申小珂和胡滨之间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另外一些老师与学生之间。在本报记者寻找的范围内，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尽管在历史的真相全部抵达之前，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 44 年，但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殴打过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返校的校友人数超出预料，9 月 18 日，原北京外国语学校的 50 周年的校庆选在了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昔日的老书记程璧已经 86 岁了，曾在“文革”中饱受批斗的她在校庆文集的题记中写道：我爱这所学校，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最初的构想中，庆典中将会加入一段默哀，以献给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长和老师。不过很多人反对这一点。她认为这与当天的和谐场景不太相衬。最终祭奠体现在主持人的对白中：很遗憾老校长莫平等人未能到会。

莫平已经死了。他在 1966 年遭到毒打，在 1968 年“文革”高峰中，“自杀”身亡。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本报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 年离校下乡到内蒙三年，1971 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申小珂发道歉信是为了消解内心的一些东西。他写过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说，发表在 1986 年的《人民文学》上。故事并不复杂：曾经饱受酷刑 A 逃出后，放火烧了敌人 B 的家，并且带走了敌人之子。多年之后当 A 叫 B 领走自己的儿子时，B 选择跳崖而死。“B 见到自己的儿子，能说什么呢？”申小珂认为这同样不可能发生在现实当中：一个殴打过自己老师的学生，能对老师说些什么呢？

但今年初夏，63 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 email 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虽未对老师施暴,但在校时他也曾戴着红袖章高喊“打倒”,对象是自己的老师。为此他无法原谅自己:“我用各种流行的观点攻击过老师们,包括程璧老师”。申小珂回忆说,他是含着眼泪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历史的另一端,程璧说,她只哭过两次,一次在批斗大会上被划为走资派的她跟着喊“毛泽东万岁”,有人打她,问:你怎么也跟着喊呢?另一次是在劳改中她穿了双解放鞋,红卫兵却觉得她不配。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19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被批斗。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但在同学张大中他们看来,和老师邻座、“谈笑风生”是一回事,正式而庄重地向老师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这些往日的红卫兵自己有了儿孙之后。他们开始酝酿道歉行动。

张大中等学生们在聚会中谈及老师的现状异常难过,当年的红卫兵中当中有人打过老师,有人没有,但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个共识:“哪怕下跪磕头,也要承认错误。”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两次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近年来的老年痴呆症尤其明显,不能吃饭不能说话,意识也陷入混乱。他是否知道有人谢罪,一时无法求证。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尔叫出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她的意识好像清醒些了。她的爱人单忠健在身边告诉她,下午你的学生来看你们了,来道歉了。李煌果点了点头。

不能因为当年的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的过错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1996年,时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学生到关秀兰家探望,买菜吃饭。席间一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毕恭毕敬把关秋兰从客厅请到卧室,扶她坐下。这位军官学生承认曾打过她,以一个笔直的军礼道歉。关很诧异,她记得当时的回答是:“我记不得了。”回到客厅她对同学们说:“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饭吃饭本身就意味着

友好。抹去风尘人心如镜,客厅里充满了静默。

关秋兰已经 81 岁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样,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师不愿意提及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批斗,只是淡淡地说:“十年啊,根本没有安稳过”。“文革”中留下的“怕”,几乎不再是一种内心感受,而是作为一种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后来的日子里潜伏了下来。同为“文革”中被批斗女老师的李煌果表现不同。恐怖记忆并没有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反而令它们愈加清晰。几年之前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言语和意识正逐渐远离她的身体。病中也或在梦中,她会被带到过去,紧跟着一阵“不要打我”的尖叫声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国内,昔日的学生张大中和王凤慧也参与到了照顾李煌果老师的行列当中。几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师突然发烧,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的急诊室。王凤慧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了老人的身边。CT 检查之后,老人被送到了旁边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王凤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终不愿意住在窗户上有栏杆和门上有锁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他甚至第一次对本报记者提及当年对李煌果老师全部两次伤害的细节:剃头,从家里揪出来跪 10 厘米宽的板凳并殴打。这些事情他从未对家人和朋友提及。“这是地道的耻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馆,他终于敞开心扉。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郭灿辉 1966 年底声明脱离红卫兵组织,至今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他会想起“文革”还未开始时,经历过反右并被开除党籍的李煌果老师,曾经单独找他谈话,建议他不要狂热。

11 月 3 日的郭灿辉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听了李老师的,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

“孩子们写得真好啊”

10 月 31 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真好啊。”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学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滨大哥的信代表了我们的的心声。希望程书记能看到我们愧疚,

也幻想莫校长的在天之灵能理解我们的忏悔。我们不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只想在自己的心灵净化过程中找到一点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个后来也成为老师的同学写道：在我当了老师以后，我才明白当师长的含义……小珂学长的道歉信是我们一代人心里的隐痛。

初一一班的一个女生这样写：你们信中的话语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反思。这一页历史不可能就这样不清不白地翻过去了。

初一二班一个男生身在美国。他打算迅速行动：“争取回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一定当面向校领导和老师们道歉。”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现在回头看看，当初被红色洪流裹挟了整个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势”的，不只是申小珂他们这些“红小兵”。当年同样遭受迫害的关秋兰老师，在劳改期间恰逢毛主席像章发行的第一天，一个初一的孩子坚持不卖给她。关很恼火地说，你如果不卖给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里。而后一个高三孩子卖给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个喧嚣的年代，保存于民间。收到道歉信后，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过两次饭。申小珂告诉程璧老师，当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师的原因在于，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装厂旁边，夜半的哭喊声经常惊醒他的母亲田绿萍。因为他母亲告诉他，绝对不能打人。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内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

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2010年11月04日南方周末）